

歐盟治理中的後民族主義因素： 法律規範下的集體認同

The Post-nationalism Factors in EU Governance: Collective Cognition Arising From Law and Regulation

黃建豪（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
100253503@nccu.edu.tw）

摘要

德國學者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曾認為，歐洲統合在憲法愛國主義的薰陶下，已培育出一種新型的「後民族主義」(post-nationalism)。由於當前的歐洲治理乃係透過公民社會的平等合作，而非舊式垂直的治理模式，因此公民社會的運作便成為歐洲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的目的，即是試圖釐清「後民族主義」所產生的「法律規範下的集體認同」將如何影響到公民社會的運作，進而形成當前的歐盟治理模式，使得原先寄存於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受到撫平或壓制。

關鍵詞：後民族主義、集體認同、歐盟治理、公民社會

Abstract: German scholar Jurgen Habermas believes that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has been bred post-nationalism, a new type of nationalism arising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Due to



the current European governance was operated through equal cooperation of civil society, rather than the old vertical model of governance, and therefore the operation of civil socie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uropean governan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hat is trying to clarify how the "post-nationalism" arising from "legal norms under the collective identity" to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civil society and thus take shape the current the model of EU governance. And it can pacify and suppress the original nationalism arised from nation-states.

Keywords:Post-nationalism, Collective Cognition, EU Governance, Civil Society

一、前言

歐洲國家歷經二次大戰的慘痛教訓後，便開始檢討導致戰爭的原因，其中多數學者認為，將歐洲各國拖向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便係不受控制的主權國家權力。為了防止歷史悲劇再次重演，學者開始針對歐洲各國的治理提出改革及創新，對於主權國家權力的轉移或限制，遂成為改革的重要方向。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的 1948 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簡稱 OEEC) 及 1949 年的「西歐聯盟」(West European Union, 簡稱 WEU) 雖未挑戰各國的主權，但已奠定歐洲政府間合作的基礎。1952 年「巴黎條約」生效後，首具歐洲統合概念的「歐洲煤



鋼共同體」正式成立，該組織係一個超國家的法人，擁有各簽署國煤鋼資源之所有權。往後歐洲統合的 60 年歷程之中，雖遭遇許多阻礙與危機，歐洲統合進程卻以前所未見的方式逐步實現。

1999 年 1 月 1 日，歐元(Euro)的推出，更宣示著具濃厚主權象徵的貨幣，在歐洲各國已走入歷史。綜觀歐盟六十幾年來的統合歷程，吾人可得知，歐洲各國的主權已逐漸讓渡至歐盟此一超國家組織中。然而各國主權的讓渡卻並非意味著永久且絕對的讓渡，主權國家的幽靈—民族主義成為歐盟統合過程中的不定時炸彈，當歐盟的政治或經濟統合遭遇阻礙或成效不彰時，民族主義隨即再度高漲，對於歐洲的治理造成威脅。

對此，德國批判理論學者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曾提出「後民族主義」(post-nationalism)的說法，認為歐洲統合應該在憲法愛國主義的薰陶下，培育出一種新型的、脫離了一般民族認同的基於法律而生的「後民族主義」。由於當前的歐洲治理乃係透過公民社會的平等合作，而非舊式垂直的治理模式，因此公民社會的運作便成為歐洲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Barbara, 2007: 4-23)本文主要的目的，即是試圖釐清「後民族主義」所產生的“法律規範下的集體認同”將如何影響到公民社會的運作，進而形成當前的歐洲治理模式，使得原先寄存於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受到撫平或壓制。

二、從民族主義到後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到法律規範的集體認同

(一)傳統民族主義下的民族認同



1. 民族主義的定義與內涵

學者對於民族主義的定義眾說紛紜，其主因在於單就民族(nation)即無法下一明確定義，霍布斯包姆(Eric J. Hobsbawm)認為，民族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概念，在十九世紀末以前，民族意指聚居在一帝國、一國及一省範圍內之人權，有時亦指外國人；二十世紀後，民族逐漸與政治實體及主權相結合。(Eric, 1990: 14-45)本文同意霍氏的民族定義演進觀點，然正由於民族定義具有此特性，連帶影響民族主義之內涵，使其在定義上同樣存在困難。

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提出於 18 世紀 70 年代(Timothy, 2003: 255-260)，而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為近代民族主義之濫觴，19 世紀為民族主義蓬勃發展的時代，民族國家因此如雨後春筍般林立。欲就民族主義作一明確定義較為困難，學者間對於民族主義的定義莫衷一是，此係由於民族主義屬於跨學科概念之故。因此倒不如將眾學者的定義加以歸類，茲將其分述如下：

1. 學說或原則：民族主義係一種學說，產生自 19 世紀初期的歐洲；(Elie, 1960: 1-5)
2. 思想：民族主義屬於一種思想狀態，亦即人民對於民族國家的忠誠思想；(王聯，2002: 15-16)
3. 政治運動：民族主義係以尋求國家權力為目標之政治運動，採此觀點的學者有布儒里(John Breuilly)等。(John, 1985:1-3)

本文對於民族主義的形式係採取布儒里的說法，將之視為一種政治運動，如此始得解釋其對於歐洲治理的影響，且政治運動較為外顯，可透過觀察而得。



值得一提的是史密斯(Anthony Smith)對民族主義之定義，史氏認為民族主義屬於一種意識型態運動，而此種運動係某一群體為了爭取自治、統一或認同。(Anthony, 2001: 8-11)此定義較為廣泛，除了將民族主義的層面擴及至政治與社會，更不將其存在之時期局限於民族國家獨立之前，本文較為認同史氏定義，如此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上才能獲得較為多元且深入的成果。(Anthony, 1995: 15-19)而提出後民族主義的哈伯瑪斯認為，民族主義本身具有工具性質，並不存有內在價值。(哈伯瑪斯，2002)

2.傳統民族主義的認同

認同原本為一傳統的哲學概念，而後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 Freud)將之定義為：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心理上或情感上的趨同過程。(Sigmund, 2003)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更於佛洛伊德的基礎上對認同提出較為具體的定義，意即認同係對於「我是誰」的回答。(Erik, 1963)而民族認同的內涵乃係同一民族的人存在著共同文化傾向性的認可與共識。學者賈西亞(Carla Ann Garcia)認為，民族認同係指不同的個體對於同一民族的信念、態度及歸屬於該民族的身分上認同。(Carla, 1997)學者芬妮(Phinney J. S.)則認為，民族認同的構成複雜，包括各對於民族的歸屬感及承諾，對於自身民族的積極評價及民族活動的參與。(Jean, 1990: 499-514)史密斯認為，民族認同已取代了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及民族特點(national character)，換言之，民族認同的內涵包括了上述兩者概念。

關於民族認同的淵源，學者的說法各一，無法出現一個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通說。然而整理各學者的說法約略可劃分為二：其一，認為民族認同的起源係自然產生，與民族主義的原生論有關，例如，埃里克森即認為，民族認同係出於



人類對於外部不安世界的一種生物本能，係用以消除外接不安世界的不利；(Erik, 1980)其二，認為民族認同乃係由建構而來，該種說法係與民族主義原生論相對的非原生論所生，或可稱之為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民族認同，例如，蓋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在從前的農業社會中，社會具有較強的孤立性，文化同質性較高；而進入工業化社會後，文化認同的形成已不同以往，需透過一種新式的文化自覺始得產生。(Ernest, 1983)本文係採取後者建構論的說法，並認為民族認同乃係一種隨著時代改變的產物，在不同時代所產生的認同各異，且即使同一民族在不同時代的認同亦大異其趣，認同本身具備進化性，在時間的推移下持續產生質變。

(二)後民族主義的新形態認同

1.後民族主義提出的思想脈絡

後民族主義係由哈伯瑪斯所提出，並以其先前的研究—「後世俗社會」(post-secular society)作為立論基礎。首先，「後世俗社會」係用以解救 911 事件後，陷入危機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由於「溝通行動理論」認為，人類可建立一套誠實與非強制的溝通模式(即其所謂之溝通理性 rationality)，因此即使缺乏宗教的作用，仍然可以從民主與平等的規範中建立理性的基礎。(Jurgen, 1985)然而 911 事件爆發後，伊斯蘭與西方基督教的衝突使得「溝通行動理論」受到挑戰，哈氏所謂的理性溝通及演化僅止於西方社會，無法一體適用於非西方國家，且宗教與世俗亦呈現前所未有的緊張關係。對此，哈氏提出「後世俗社會」以解釋及試圖緩解宗教與世俗的緊張，「後世俗社會」係指一方面堅持世俗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則正式宗教的存在，認清在每件事件中宗教與世俗的界線並非固定，並謹慎地推進世俗化的進程。世俗的啟蒙傳統與宗教教義須透過相互學習以



反思各自的限度。(Jurgen et al., 2006: 38-39)

「後世俗社會」的出現，帶動促使了對於多元宗教及文化的尊重，於是後民族主義的超越民族國家的新型態集體認同始得出現。二戰結束後，歐洲學界開始重新省思納粹德國在二戰的罪行，而身為的德國人的哈伯瑪斯也不例外，企圖藉由「憲法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提出，來取代德國人歷史悠久的「浪漫愛國主義」(romantic patriotism)。「憲法愛國主義」係一種具有包容性及公民政治自主性的新形態愛國主義，其內涵係指現代民族國家中，公民對於國家憲法的自由平等原則普遍存在的認同與忠誠，並伴隨著自由的政治文化出現。哈氏歸納法國大革命後的歷史演進後指出，民族主義原本與共和主義乃係一體關係，惟其結合在一起僅是偶然的歷史關係，民族具有雙面性質。其一，將民族視為一種法律共同體的共和主義；其二，將民族視為歷史命運共同體。而在現今的社會中，尊重多元文化與個體現代化為時勢所趨，因此共和主義有提倡及發展的必要，在共和主義的實行下，多元文化使得在同一性的基礎上保持差異性。(彭剛， 2009: 2-4)

然而在共和主義中，維持多元的同一性基礎為法治國家的政治文化，而該種政治文化便係基於對憲法的認識與解釋。由於當前的憲法主要基本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法治國原則等皆係保障公民的權利義務，因此公民在認知該憲法內容的過程後，始相互陌生的人民產生一種政治共同體的認同，相互主張權利並負擔義務。此種法治國家的政治文化所產生的認同，並非基於共同血緣及語言所產生，因此有別於一般的傳統民族認同，具有較高的包容性，且為現今多元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認同。而哈氏所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中，便存有此種特有政治文化的認同。



1.後民族主義的新型態認同—法律集體認同及其批判

哈氏提出的後民族主義認同具有兩個層次：其一，在國家層次上，由於傳統的民族認同著重在相同血緣、語言及歷史文化的凝聚，對於現今的多元文化及社會將產生分裂的效果，僅而妨害到少數群體的平等權利。因此，政治共同體的集體認同與社會的團結不可再依賴傳統的民族認同；其二，在國際層次上，後民族主義的認同將突破傳統的民族主義認同，有利於國際組織運作、區域整合及跨國政治合作，可望使民族國家因應全球化的挑戰。(馬珂，2010: 53-55)

史密斯認為，現今在民族主義研究上存在四大範式：現代主義(modernism)、原生主義(primordialism)、族群象徵主義(ethno-symbolism)及永存主義(perennialism)。(Leonhardt, 2011)而哈氏或可歸類於現代主義的民族主義範式，這種範式強調民族與認同的建構性及現代性運動，且由於其認為民族主義具有某種程度的工具性，當，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符合當前社會的利益時，則有存在之必要，反之則否。由此亦可說明，哈氏為何提出後民族主義及以法律建制為中心的集體認同來取代傳統的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然而後民族主義及其新型態認同出現後，是否即受到傳統的民族主義的威脅或抵抗?哈氏對此採否定看法，認為公民出現憲政的法律體系的集體認同後，對於傳統民族認同的依賴將逐漸消失，因此沒有相互衝突及威脅的問題。(Jurgen, 2002)

學者泰勒(Charles Taylor)曾針對加拿大魁北克的民族獨立運動做研究，從該個案中提出「承認之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概念，「承認之政治」主要用以解決國家對於多元文化的適當保護措施，首先，泰勒認為文化多元主義所提出的國家對於少數民族的反歧視保護措施，僅是臨時性的政策。國家隨時得終止對於少數民族的保護，屆時少數民族將



重新面臨無差別待遇，而「承認之政治」便係從自由主義的無差別待遇及文化多元主義之間選擇一條中間路線，亦即一種特殊的自由主義模式，透過給予少數民族高於多數民族的憲法權利，使其得以建立真正自我的身分認同並獲得多數民族的承認，例如，對於少數民族給予高度自治的方式劃定特殊區域。(Charles, 2013)「承認之政治」某種程度上挑戰了哈氏所謂的法律集體認同，然而哈氏認為，「承認之政治」的作法將引起新的問題，即使給予少數民族較高的憲法上權利，仍係治標不治本的政策，因為在時間的推移下，多數民族中還是會出現新的少數民族。哈氏又更進一步指出，唯有提出政治文化來整合多元文化中的集體認同，始得保證各族群的平等及各自的特殊認同。(馬珂，2010: 63-66)

然而本文認為，即使哈氏提出「後民族主義的法律集體認同可使人民去除對於傳統民族主義與認同的依賴」，仍無法說明當前歐洲統合過程中，長期存在的民族主義浪潮，例如，希臘信貸危機中的經濟民族主義浪潮(詳見第四章)。因此，法律集體認同的形成顯然無法完全消除傳統民族主義的依賴，傳統的民族主義仍長存在公民的潛意識中伺機而動，成為當前歐洲治理下的隱憂。

三、當前歐盟多層次治理的公民社會因素

(一) 歐盟多層次治理的建立與內涵

1. 歐洲統合進程與多層次治理的建立

歐洲統合進程源自 1948 年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及 1949 年的「西歐聯盟」。兩個區域組織奠定了日後歐洲政府間合作的基礎。1952 年的《巴黎條約》建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該組織具有超國家法人性質，並擁有各簽署國煤鋼資源所有權。而後歐洲國家雖歷經「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ean Defense Treaty)的失敗，而將統合層面專注於經濟及其他領域



上，1957年「巴黎條約」的簽署，建立了「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及「歐洲經濟共同體」。英國原先便不積極參與歐洲統合事務，惟為避免被排除在歐洲經濟事務之外，遂成立「歐洲自由貿易區」(European Economic Free Trade Area, 簡稱EFTA)與之抗衡，而後英國經歷蘇伊士運河事件(Suez Crisis)¹的挫敗，了解自己已喪失昔日強權地位，進而改變外交政策，並於1961年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張亞中，2001: 45-52)往後歐洲統合的40年歷程之中，雖遭遇許多阻礙與危機，例如1965年7月的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所引發的「空椅危機」(Empty Chair Crisis)²、1980年代初期英國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下受擱置的「丁德曼報告」(Tindemans Report)³等。歐洲統合進程卻以前所未見的方式逐步實現。1991年12月歐洲各國簽訂「馬斯垂克條約」，確立歐盟三大支柱—「歐洲共同體」，涉及經濟、環境及社會政策；「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涉及外交及軍事等政策；「刑事領域警務與司法合作」，有關共同打擊犯罪之合作，在三大支柱的合作下，歐洲統合已愈形深化及廣化，而歐洲各國的主權亦逐漸流失。1999年歐元推出後，使歐元區各國的原有貨幣走入歷史。

2001年歐盟拉肯高峰會(Laeken European Council)通過「拉肯宣言」(Laeken Declaration)，設立歐洲制憲大會(The

¹ 埃及原為英國殖民地，二次大戰後英國自該運河撤兵。1952年該國發生政變，新掌權者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施行民族主義政策，導致該國與以色列及西方國家衝突連連。1956年7月，埃及將該運河收歸國有，同年10月，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雙方戰事爆發。在英法兩國調停無效之下，兩國軍隊進入該區，試圖借機推翻納塞爾政權，惟遭美蘇兩國分別以終止經援與威脅動用核武方式制止。

² 1965年戴高樂為反對歐體執委會與荷蘭等國提出歐體財源自主及增加歐洲議會議案審核權，遂以共同農業基金問題為藉口，表達對歐體運作之不滿，連續缺席歐體重大會議達6個月之久。

³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主張的「政府間主義」，使1980年代初期的歐洲統合屢受阻礙，形塑超國家權威的構想與行動倍受限制，「丁德曼報告」受擱置即為適例，該報告極富超國家主義精神，提出許多歐盟深化建議，尤其「雙速歐洲」(two-speed Europe)概念影響日後歐盟統合最為深遠。



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Union, 以下簡稱「制憲大會」)為歐洲立憲奠定基礎。2002年2月,制憲大會在布魯塞爾召開,目的在為歐洲制定一個「憲法性條約」(Constitutional Treaty),翌年6月,制憲大會主席季斯卡(Valery Giscard d'Estaing)於薩羅尼亞高峰會議(Thessaloniki European Council)提交「歐洲憲法條約草案(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根據該草案第9條、第12條及第13條,歐盟之權限按照其與成員國之間的權能分配可區分為,「專有權限」(Exclusive Competence)與「共享權限」(Area of Shared Competence),專有權限旨在維持聯盟內部市場正常運作所需之競爭規則,在專有權限的領域範圍內,只有聯盟可以立法並採取具有法律拘束力之行為;而共享權限領域則由聯盟與會員國共享權能。專有權限的領域分別為:歐元的貨幣政策、共同商業政策、關稅聯盟及共同漁業政策中的海洋生物資源保護。(EU, 2004)惟該草案雖於2004年6月的都柏林高峰會議(Dublin European Council)通過,2005年5月卻遭法國與荷蘭公投否決,歐洲憲法的推動暫時陷於停滯。

2007年12月,歐盟27國領袖於葡萄牙里斯本高峰會中簽署了「里斯本條約」,取代2005年遭法、荷公民投票否決的「歐洲憲法草案」,化解了歐盟整合危機。該條約使各成員國在當前亟需解決的歐盟定位、歐盟決策機構之民主性與效率、基本人權保障、全球暖化、能源政策等問題上達成共識並一致對外立場,提升了歐盟全球競爭力的條件與實力,惟對於歐洲各國的國家主權來說無疑又是一次嚴重衝擊。歐盟27國外長於2010年7月26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外長會議上,最終批准了成立新的歐盟外交機構——歐洲對外行動局(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2. 歐洲多層次治理的內涵



有關治理的定義眾說紛紜，學者彼得森(John Peterson)及邦伯格(Elisabeth Bomberg)認為，治理係指對於有價值資源全面掌控並分配的強制行為。(John et al., 1999)亦有學者謂治理等同於政府，由國家來掌控社會的導向。(Gerry, 1998: 17-28)維也納(A. Wiener)則認為，治理係指分散且去疆界化的權威。(Antje, 2000: 318-341)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則將治理定義為可產生影響的規則、過程及行為之權力。(European Commission, 2001)本文係以歐盟治理為研究主題，故採取歐盟執委會之定義。綜觀歐洲統合的歷程中，各成員國的國家主權逐漸讓渡至各超國家組織，使得歐盟治理逐漸出現「次國家、國家、超國家及跨國家」的多層次治理。此種多層次治理為自 1648 年西伐利亞條約簽訂後前所未有的現象，國家不再壟斷政治權力，並與歐盟的各機構與次國家層次的行為體共同分享權力。

歐盟多層次治理途徑的提出係力圖打破昔日在歐洲統合進程中，兩大主義的對峙—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使得統合理論可望與多元主義及新功能主義相結合。然亦有學者將當前眾多學者對於歐盟多層次治理所提出的說法歸納為五項重點：(藍玉春，2005: 50-51)

- (1) 不具國家地位政府型式
- (2) 呈現網狀結構且缺乏單一模式之決策過程
- (3) 會員國不再是次國家與超國家間的唯一中介點
- (4) 國內政策之歐盟化程度
- (5) 多重政治認同

其中第(5)項的論點，本文認為仍待周全並持保留說法，學者胡吉(Liesbet Hooghe)及馬克思(Gary Marks)指出，在歐盟多層次治理下，公民的認同亦表現出多重的政治認同，而這些認同相互間並非零和競爭，例如，區域認同的形成並不妨害國家認同的存在，甚至出現相輔相成的效果。(Liesbet et al., 1994)實則政治認同雖可並存且相互影響，然而涉及到民



族國家存亡抑或利益時，這些潛藏的傳統民族主義浪潮將再度出現，並與國家認同合流，在歐盟治理中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動勢力，阻礙歐盟的統合進程。歐債危機中的經濟民族主義即為適例(詳見後述)。

(二)公民社會的運作與歐洲多層次治理

傳統的治理為垂直由上而下的模式，治理的行使主體以國家為主；然歐盟的多層次治理卻係以水平性的平等合作為基礎，國家的權力逐漸被各部門拆解，決策權力由各層次中的行為者所分享，缺乏單一決策模式，且在每個領域的決策模式皆大異其趣。(Liesbet et al., 1994: 232-236)歐洲的公民社會發展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曾提出「政治的社會共同體」(Political Society Community)一詞，意指享有自由與平等的公民在共同合法的法律體系下，所形成的政治共同體。(David, 2000)至羅馬帝國時期，哲學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賦予公民社會明確的定義，認為公民社會係指已出現城市文明的政治共同體的生活情況，公民自願性的聚在一起工作，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John, 2013)而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使歐洲進入黑暗時期，文明與思想發展的停滯直接影響公民社會的發展。

至中古世紀，城市的發展與市民階層的壯大使得歐洲的封建制度瀕臨瓦解，有利於市民社會的發展，而政治及社會制度的轉變亦影響著思想的變化，進而導致了十五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運動中，公民社會的概念重獲重視，奠定了公民社會在十七世紀啟蒙運動中的重要地位。而此時期的公民社會已相當接近現今的公民社會概念，並具有以下幾個特徵：其一，公民社會屬於一種政治社會類型；其二，公民社會指的是一種文明、道德及進步的社會生活狀態；其三，公民社會是一種公民平等參與的政治倫理社會。(何增科，1994: 4)而柯恩(Jean L. Cohen)與阿拉托(Andrew



Arato)認為，公民社會當中沒有經濟層面的要素，僅存在政治及社會要素，由私人領域、團體、社會運動及大眾溝通形式所組成。(Jean et al., 1999)

根據 2001 年的《歐盟治理白皮書》指出，公民社會為當前歐盟治理中所不可或缺之要素，透過與各種公民社會組織的對話，可促進歐盟善治的達成，因此當前歐盟首要之務乃係建立與公民社會的溝通平台。(Eur-lex, 2001)曾有學者指出，歐盟的多層次治理可包括次國家、國家、超國家及跨國家等層次，其中公民社會便屬於跨國家與超國家層次的行為者。(藍玉春，2005: 65-66)公民社會透過歐洲政黨、地方政府、企業利益團體、環保人士及知識社群等組織形成跨國的官僚網絡，進而突破國界的限制。2002 年歐盟執委會通過《歐盟執委會諮詢相關團體之基本原則與最低標準》(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ward a reinforced culture of consultation and dialogue-general principles and minimum standards for consultation of interested parties by the commission)，該標準建立了幾項規範與標準：其一，公民社會組織與歐盟機構的對話行為規範；其二，擬定公民社會組織對話所應具備的資格與條件；其三，訂定公民社會所需改善的方向。(Eur-lex, 2002)

2006 年歐盟執委會提出了《歐洲交流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a European Communication Policy)，該白皮書除了擬定許多增進公民社會政治參與及相互對話的方案，藉以提高歐盟的凝聚力。又更進一步指出，當前歐盟公民對於歐盟制定的政策大多無法了解且欠缺參與感，而這有賴於公民社會、歐盟機構及國家公權力的相互協助。(Eur-lex, 2006)2009 年《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通過，該約確立了「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原則，主要核心概念便係



透過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協商，加強公民的政治參與。而實施方式有二：首先，強調並保障公民參與歐盟政策決策過程的權利；其次，歐盟各機構有義務與公民社會組織展開公開及透明的對話。(Eur-lex, 2007)綜觀上述公民社會在多層次治理的作用中，尚僅能在決策尚未制定的參與投入階段，而非決策階段，在功能上類似於紛爭解決與協商的跨國行為者。(請參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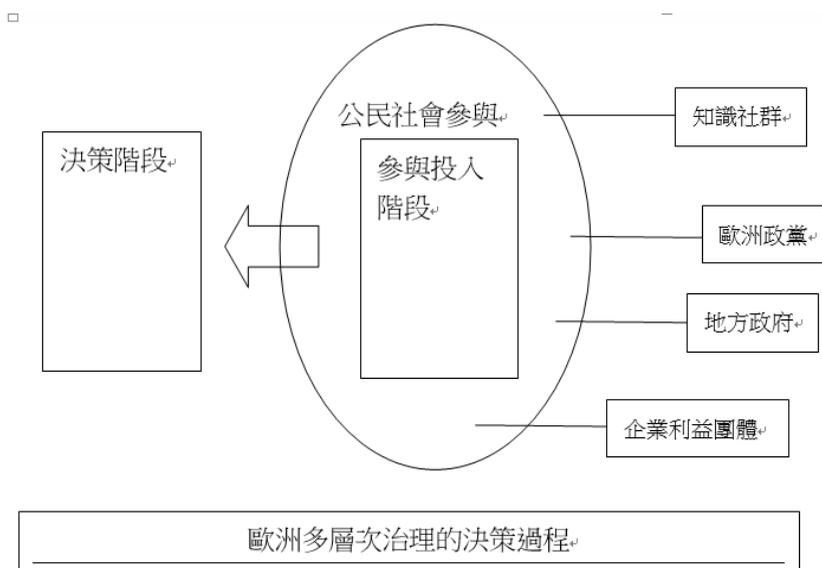


圖 1 歐盟多層次治理下的公民社會參與

四、後民族主義對於歐洲治理的影響與傳統民族主義的隱憂

(一)法律規範的集體認同與歐洲多層次治理的關係

如前所述，哈伯馬斯的後民族主義中，最重要的兩大要



素為法律規範的集體認同及政治文化的產生。其中法律規範的集體認同係從憲法愛國主義中，對於憲法重要基本權利的保障所產生的認同。這種憲政法律的集體認同，在公民社會的運作上，將產生某種程度的凝聚力，更由於憲法重要基本權利已分散在歐盟的各項政策中，例如，歐盟《申根協定》的通過，即與人民的重大的遷徙權利有關。然而在人民的某些非重大的基本權利中，即無法產生法律規範的集體認同，缺乏此種認同的結果，就是公民社會發揮的作用減輕或消失，這些政策也將較不容易通過。例如，歐盟的語言政策等是，以下分別就重大的基本權利政策與非重大的基本權利政策做一比較，藉以顯示出法律規範集體認同影響公民社會運作的差異。(參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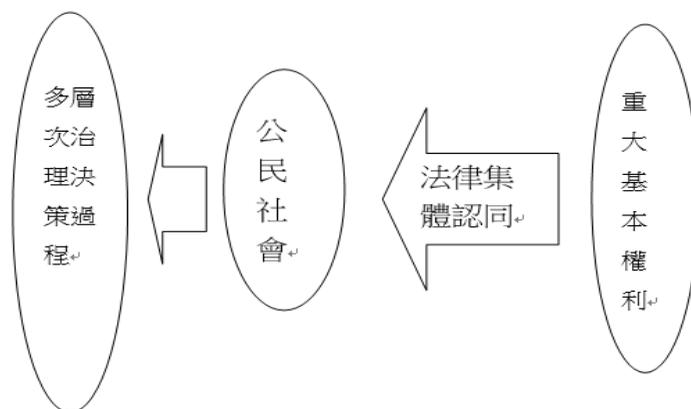


圖 2 法律集體認同與多層次治理

1. 《申根協定》的通過—重大基本權利(遷徙自由)

《申根協定》係源自 1985 年，由法、德、荷、比、盧於盧森堡小鎮申根簽署。該協定主要目的係在實現歐洲各國之間人員與貨物的自由往來，俾利推動歐洲統合進程。協定主要內涵有三：其一，成員國相互開放邊境，並廢除邊境檢查；其二，倘若外國人獲准進入《申根協定》的任何一個締約國，即可在其他締約國領土上自由通行；最後，設立成員



國間的警察合作與司法互助制度。(Europa: Summaries of EU Legislation, 2009)《申根協定》的通過意味著成員國間疆界的解除，疆界屬於重要的主權國家象徵，何以多數歐洲國家可以輕易地拋棄國家原有的權力，其原因即在於法律集體認同的作用推動了公民社會的運作，進而使該協定順利地在各國通過。

在《申根協定》簽訂過後的 8 年後，《馬斯垂克條約》確定了歐洲的公民權，使聯盟內的各成員國人民的遷徙權受到保障。在歐盟成員國對於遷徙權保障的高度認知下，產生了法律的集體認同，進而推動公民社會的運作，使《申根協定》在短短的 30 年內，成員國從原先的 5 國擴張至 2011 年的 26 國。例如，瑞士在 2005 年 6 月針對加入《申根協定》舉行全民公投時，各企業利益團體(特別是旅遊業者)便開始上街宣傳加入該協定的好處，致使該國順利以 54.6% 的贊成率通過《申根協定》。(劉君，2005)

2. 歐盟共同語言政策的問題—非重大基本權利

歐洲共同語言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遭遇許多阻礙，各國各自為政，堪稱歐洲統合中最為失敗的領域。而歐盟則認為，支持語言的多元化為歐盟語言政策的核心，因此歐盟的官方語言共有 23 種。實則共同語言的議題非屬重大人民權利，是以無法形成法律集體認同，公民社會的運作便無從推動，在共同語言政策的制定上必定無法如《申根協定》般順遂。

(二)傳統民族主義的幽靈—以希臘信貸為例

1. 希臘信貸危機的始末

2001 年希臘加入歐元區後，依據 1992 年簽署的馬斯垂克條約規定，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成員國須要符合兩項標準，其一為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 3%；其二為



成員國的負債比率須低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60%。然而當時的希臘皆無法達到這項標準，因此希臘便向美國的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求援，藉以掩飾自己高達 10 億歐元的債務，高盛以「貨幣掉期交易」(Cross Currency Swap)的方式，先將希臘的政府債務，以美元或其他貨幣發行，再預訂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換回歐元債務，帶該筆債務到期後，高盛再以其換回美元，而這些兌換的行為並非以市場匯率為基準，而係以高盛提供的優惠匯率為標準。換句話說，高盛表面上係貸與希臘 10 億歐元，由於優惠匯率使得希臘的回款期限得以延長，因此使希臘的公共負債比率降低至 1.5%，符合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Beat, 2010)

高盛除了隱藏幫希臘這筆借貸，還為其設計了多種換取現金卻不會使負債率上升的方法。例如將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以換取現金。這種抵押方式使希臘由借貸現金轉為出售資產，即銀行債權證券化。而高盛亦獲得高達 3 億歐元的備金。由於高盛預見希臘往後的經濟必然會有危機，還向德國一間銀行購買 20 年期的 10 億歐元「信用違約互換保險」(Credit Default Swap)，以保障其對希臘的債權。(Financial info, 2012)

國際信評機構惠譽(Fitch Ratings)於 2009 年 12 月 8 日突然宣布，將希臘債信自 A-調降為 BBB+，而同月 16 日，國際信評機構普爾(Standard & Poor's)亦宣布，將希臘的長期債信由 A-降級為 BBB+，並警告希臘，倘若其仍舊無法改善財政狀況，將進一步降低其主權信用評級。此舉帶來希臘股市的大跌與國際市場上的避險措施。(Izabella, 2009)

2.希臘經濟民族主義的作用

信貸危機爆發後，歐元區的成員國為了是否救助希臘展



開論戰，2010 年 1 月，歐洲央行行長特里榭(Jean-Claude Trichet)表示，沒有任何國家可獲得特殊對待，而希國需要採取艱難的決策。言下之意是雖然同意援助希臘，然而希國亦必須透過改革或緊縮的方式裁減自身財政赤字。歐元區成員國認為，希臘在 2001 年起便請高盛作假帳，如今面臨破產，實是咎由自取。希國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表示，儘管希臘目前的處境十分艱辛，仍樂觀地信任自己的執政團隊，並呼籲人民切勿驚慌。而他也宣示了改革的決心，將 2010 年作為希國的「改革年」，修改後的穩定與發展規劃，在國內除了要改革中央地方政府的管理，更需達到施政透明化的效果。(Jeffrey et al., 2010)

儘管帕氏對希臘的改革做出許多承諾，歐元區的各成員國仍然不信任希國能完成這些改革，因此歐盟內部開始研擬一些監督希臘裁減財政赤字的措施，包括要求希國提供高額抵押金，如果無法達到裁減赤字的目標，這些抵押金將予以沒收。希國又於 2010 年 4 月正式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求援，而其與歐盟及 IMF 的談判皆於國內舉行，希國需要在 2010 年 5 月 19 日前取得援助，德國總理梅克爾則表示，倘若希國滿足相關條件時，援助程序才會啟動，而這些條件包括：政府的節省開支、可證明能回復並持續的經濟成長計畫。(Richard et al., 2010)當歐元區各成員國開始要求希臘緊縮政府開支時，引起了希國人民的不滿，紛紛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自 2010 年起，全國各地不斷地發生罷工及暴動，其中有幾次較為嚴重的示威行動：(1)2010 年 5 月的示威行動：再該月份的示威行動中，共計有 10 萬餘人參與，其中不乏左翼、共產黨及無政府主義的支持者。5 月 4 日，發起全國性的大罷工，其主要訴求為反對政府遵循援助計畫，刪減開支並增加稅收。罷工的群眾聚集在雅典街頭，據估計人潮最多時曾多達 50 萬人，隨著抗議情



勢越演越烈，群眾開始衝撞國會大廈與警察展開激烈衝突。左翼份子及共產黨支持者開始放火焚燒銀行，並拿著反資本主義的標語，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傷，共有 37 人遭到逮捕。(Herald Sun, 2010)有分析家指出，這個示威行動只是社會長期動盪的開始，而社會一但進入長期動盪，隨之而來的將會是長期經濟嚴重衰退。(Dan, 2010)

(2)2011 年 2 月的示威行動：此次示威共計有 10 萬人上街頭，其主要訴求是為反對德國總理梅克爾所提出的對希借貸計畫，該計畫具有財政緊縮政策的附加條件。(Tony, 2011)

(3)2011 年 5 月到 8 月的示威行動：5 月的示威行動係藉由臉書(Facebook)的輔助而號召，在網路上聚集了 9 萬人，實際參與示威的則有 3 萬人。群眾聚集在國會廣場，其中兩個最受歡迎的標語為「我投票、你投票、他(她)也投票，但是這些票卻被偷走了」、「錯誤 404，找不到民主」(模仿電腦上網頁找不到的畫面)。這兩個標語尤其值得注意，很顯然地，希臘的人民認為他們雖是國家的主人，但是卻又喪失了政策的自主權，隨著歐盟及 IMF 的援助不斷到來的，是一個又一個的財政緊縮政策，希臘這個民族國家，已經完全喪失了經濟政策的制定權，而任由他國擺佈。因此他們站出來的理由，便是要捍衛希臘人民在經濟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權。(Jerome, 2011)

(4)2012 年 2 月的示威行動：2 月 12 日，共計有 50 萬人聚集於國會外的廣場，目的還是要抗議隨著援助而來的財政緊縮政策。超過 25 棟房屋被焚燒，及 40 位政府官員受傷。(CNN, 2012)

在國際政治上的壓力與國內經濟民族主義的浪潮之下，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面臨兩難困境，於是在 2011 年 10 月 31 日決定將紓困案交付公投，此舉引起世界各國一片譁然，而各國的股市也應聲大跌，使希臘一時之間成為眾矢之



的。(BBC News, 2011)在世界各國股市一面慘綠後，希國財政部長范尼塞洛斯(Evangelos Venizelos)於同年 12 月 4 日宣布，正式放棄全民公投。(RIANOVOSTI, 2011)然而從希國之後接連不斷的示威與 2012 年大選極右政黨支持率大增的情形看來，經濟民族主義浪潮的威脅從未減弱。

從希臘的案例無人可以了解，傳統民族主義從未遠離民族國家，當哈伯馬斯提出後民族主義，並認為人民可藉由傳統民族認同的轉化，將原先對於民族主義的依賴轉移至法律的集體認同上。然而本文認為，後民族主義所產生的法律集體認同存在係無庸置疑，然而傳統的民族主義仍潛藏在民族國家的人民心中，一旦民族國家面臨政治或經濟上的存亡危機，將又起而影響歐盟治理，使得歐洲統合進程蒙上陰影。(後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抗如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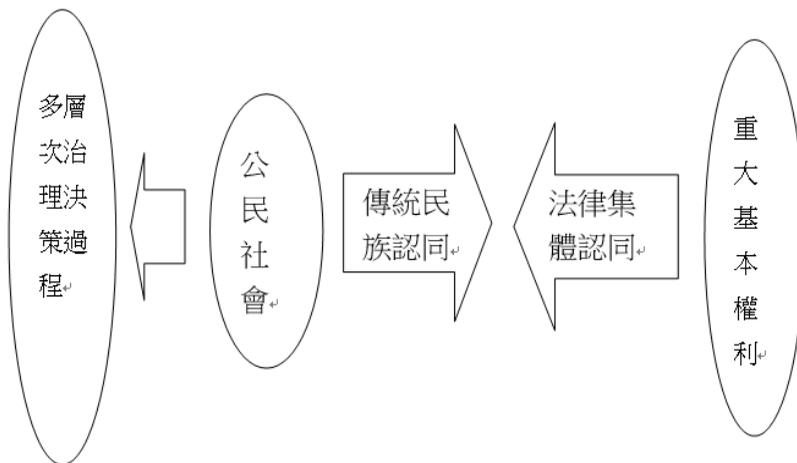


圖 3 後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抗圖

五、結論



哈伯馬斯的後民族主義乃係觀察歐洲統合歷程所得之成果，而歐洲統合歷程乃係自古以來從未出現的現象，因此在研究上屬於新的概念，而新概念的提出，必定存在著許多漏洞與矛盾。這些矛盾皆有待往後的學者補充與檢驗，本文認為，後民族主義的出現，乃係以憲政法律的集體認同與政治文化為基礎，然而憲政法律的集體認同則係對於憲法保障的重要權利義務所產生，然而何謂重要的權力義務則有待精確的定義與闡述。經過研究後，發現的確唯有與重要權利義務相關的政策領域，法律集體認同才會產生，進而推動公民社會的運作，使歐盟的相關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另一個有待解決問題則係後民族主義與傳統民族主義的並存問題，由於傳統民族主義雖為建構所生，然而只要民族國家存在的一天，民族主義就仍然存在於人民的心中伺機而動。哈氏對於後民族主義產生的法律集體認同似乎頗具信心，認為如此的認同將有助於脫離傳統民族認同的依賴。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從希臘的個案吾人可以了解，傳統民族主義仍隨著統合進程的成敗而不斷被激化。因此只要傳統民族主義仍然存在，便須釐清傳統民族主義與後民族主義的關係，孰強孰弱？兩者的競合關係如何？這些都是值得再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聯(2002)。世界民族主義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何增科(1994)。市民社會概念的歷史演變，中國社會科學，5。
- 哈伯瑪斯著，曹衛東譯(2002)。後民族結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馬珂(2010)。後民族主義的認同建構及其啟示。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亞中(2001)。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北：揚智出版社。
- 彭剛(2009)。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與憲法愛國主義，江西社會科學，7。
- 劉君(2005)。瑞士跨入申根大門。2005年6月7日，取自 http://big5.gmw.cn/01gmr/2005-06/07/content_246323.htm。
- 藍玉春(2005)。歐盟多層次治理：論點與現象，政治科學論叢，24。

英文部分

- Balzli, Beat (2010) “How Goldman Sachs Helped Greece to Mask its True Debt.” Retrieved May 20, 2016, from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0,1518,676634,00.html>.

BBC News (2011) “Greek Crisis: Papandreou Promises Referendum on EU Deal.” Retrieved July 9, 2016, from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5526719>.

Bilefsky, Dan (2010) “Three Reported Killed in Greek Protests.” Retrieved June 11, 2016,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0/04/28/business/global/28drachma.html?_r=1.

Blanning, Timothy C. W. (2003) *The Culture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Culture: Old Regime Europe 1660-17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euilly, John (1985)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NN (2012) “Amid Clashes, Greek Parliament Approves Austerity Measures.” Retrieved July 9, 2016, from <http://edition.cnn.com/2012/02/12/world/europe/greece-debt-crisis/index.html>.

Cohen, Jean L. & Andrew Arato (1999) *Decision-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Palgrave.

Czuczka, Tony (2011) “Merkel Says EU Considering Extension of Financial Aid Program for Greece.” Retrieved July 12, 2016, from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2-22/merkel-says-eu-considering-extension-of-financial-aid-program-for-greece.html>.

Donovan, Jeffrey & Frances Robinson (2010) “Trichet Says



Greece Won't Receive 'Special Treatment'." Retrieved June 6, 2016, from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UqRuv3lvU3g>.

Efferink, Leonhardt van (2011) "Nation, nationalism and state 2 - Modernism, Ethno-Symbolism, Primordialism." Retrieved May 24, 2016. From http://www.exploringgeopolitics.org/Publication_Efferink_van_Leonhardt_Nations_Nationalism_States_Modernism_Ethno_Symbolism_Primordialism_Perennialism_Identity_Ethnies_Vernacular_Languages_Industrialisation.html.
EN:PDF.

Erikson, Erik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Erikson, Erik. H. (1980)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W. Norton & Company.

EU,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http://european-conventi>

Eur-lex (2001) "European Governance: A White Paper." Retrieved June 5, 2016, from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com/2001/com2001_0428en01.pdf.

Eur-lex (2002)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ward a reinforced culture of consultation and dialogue-general principles and minimum standards for consultation of interested parties by the commission." June 8, 2016, from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



M:2002:0704:FIN:

Eur-lex (2006) “White Paper on a European Communication Policy,” Retrieved June 28, 2016, from http://europa.eu/documents/comm/white_papers/pdf/com2006_35_en.pdf.

Eur-lex (2007) “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igned at Lisbon, 13 December 2007.” Retrieved May 15, 2016, from http://europa.eu/documents/comm/white_papers/pdf/com2006_35_en.pdf.

Europa: Summaries of EU Legislation (2009) “The Schengen area and cooperation.” Retrieved June 16, 2016, from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justice_freedom_security/free_movement_of_persons_asylum_immigration/133020_en.htm.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European Governance: A White Paper.” Retrieved June 3, 2016, from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com/2001/com2001_0428en01.pdf.

Financial Info (2012) “Greek Officials Exposed Goldman Sachs Has Provided Secret Loans.” Retrieved July 15, 2016, from <http://www.financialinfo.co/greek-officials-exposed-goldman-sachs-has-provided-secret-loans.html>.

Finke, Barbara (2007)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in EU Governance.” Living Review of Euro. Governance,



2(2)(2007), 4-23.

Garcia, Carla Ann (1997) *Ethnic Identity: Relationship to Self-esteem and Ethnic Identity Formation*.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Gender.org. (2003) "Freud the Father of Psychoanalysis." Retrieved June 5, 2016, from http://www.gender.org.uk/about/01psanal/11_freud.htm> (2003).

Habermas, Jurgen & Joseph Ratzinger (2006) *The Dialectic of Secularization: On Reason and Religio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Habermas, Jurgen (1985)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MA: Beacon Press.

Habermas, Jurgen (2002)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rald Sun (2010) "Greek Bank Staff Strike After Firebomb." Retrieved June 16, 2016, from <http://www.heraldsun.com.au/news/breaking-news/greek-bank-staff-strike-after-firebomb/story-e6frf7jx-1225862832147>.

Hobsbawm, J. Eric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oche, Liesbet & Gary Marks (199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A: MIT Press.

J. S., Phinney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review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499-514.

Kaminska, Izabella (2009) "Fitch Downgrades Greece to BBB+." Retrieved June 12, 2016, from <http://ftalphaville.ft.com/blog/2009/12/08/87676/fitch-downgrades-greece-to-bbb/>.

Kedourie, Elie (1960)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Korten, David C. (2000) "The Civil Society: An Unfolding Cultural Struggle." Retrieved June 8, 2016, from <http://cyberjournal.org/authors/korten/CivilizingSociety.shtml>.

on.eu.int/docs/Treaty/cv00850.en03.pdf> (2004)

Onen, John (2013) "Civil Society: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Retrieved June 20, 2016, from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ROvOi8USW54J:www.newvision.co.ug/mobile/Detail.aspx%3FNewsID%3D638312%26CatID%3D4+Marcus+Tullius+Cicero+civil+society&cd=6&hl=zh-TW&ct=clnk&gl=tw>.

Peterson, John & Elisabeth Bomberg (1999) *Decision-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Palgrave.

RIANOVOSTI (2011) "Greece Rejects Referendum on EU Bailout Agreement." Retrieved July 20, 2016, from <http://en.rian.ru/world/20111104/168416426.html>.

Roos, Jerome (2011) "Livestream of the Protests at Syntagma



Square, Athens.” Retrieved July 2, 2016, from <http://roarmag.org/2011/05/greek-revolution-protests-live-stream-syntagma-square/>.

Smith, Anthony D. (1995) “Gastronomy or geology?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1), 18-19.

Smith, Anthony D. (2001)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Stoker, Gerry (1998)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0(155), 17-28.

Taylor, Charles (2013)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Retrieved May 4, 2016, from http://elplandehiram.org/documentos/JoustingNYC/Politics_of_Recognition.pdf.

the guardian (2010) “No EU Bailout for Greece as PM Promise to ‘put house in Order’.” Retrieved May 10, 2016,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business/2010/jan/28/greece-papandreou-eurozone>.

Wachman, Richard & Nick Fletcher (2010) “Standard and Poor’s Downgrade Greek Credit Rating to Junk Status.” Retrieved June 18, 2016,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business/2010/apr/27/greece-credit-rating-downgraded>.

Wiener, Antje (2000) “The Embedded Acquis Communautaire: Transmission Belt and Prism of New Governance,” In: Karlheinz Neunreither and Antje Wiener,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Amsterdam: Institutional Dynamics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pp. 318-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